

美学家的“家”和他的“背影”

——追忆王朝闻先生

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美学室、中华美学学会 刘悦笛

王朝闻老先生走了。

但哀思却绵绵而来，斩也斩不断，理亦理还乱。

只忆起到先生家首度和末次的拜访，两次的感思迥异，而前后的对比不禁令人唏嘘。

四年前的暖冬，当时读博的我，正被借调在中国文联《美术》杂志，有幸与杂志的同仁们一同拜会先生。王朝闻先生是《美术》的老主编，也是最德高望众的引路人。杂志社至今还高悬着先生的大幅照片和亲笔题字——“独见与共识之统一，构成美术批评之新感与科学性”。每当在忙碌之余，作编辑的我抬头看到先生那“扭扭曲曲”的字时，总能久久回味其中的深刻意蕴。

《美术》的历任主编中既有理论家又有艺术家，但身兼美学家和艺术家的，迄今恐怕只有先生一人。在先生担任《美术》主编的前后岁月里，也就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，先生就出版了6本论文集：《新艺术创作论》（1950年）、《新艺术论集》（1952年）、《面向生活》（1954年）、《论艺术的技巧》（1956年）、《一以当十》（1959年）、《喜闻乐见》（1963年）。的确，先生在新中国的美术批评和美学理论建构方面功勋卓著！

先生过去的家还在红庙，一个如“巢”般的温暖小屋中，金黄的阳光倾泻至墙角。那整个都房间充溢着暖暖的“美”意，因为先生自己的作品（成为新中国美术代表作之一的圆雕《民兵》）、各式各样的彩陶（好像大多是庙底沟、半山类型风格）、几尺条幅（有别人的书也有别人的画）皆在其中争胜，不愧是美学家的“家”，绝非是纯理论家的“家”那种“从书本到书本”的家居陈列。

最引起我注意的，则是另两样东西，它们分别占据这家中的一“多”一“少”。

这一“少”，是屋内唯一的一幅版画：吴凡的《蒲公英》。这幅作于1958年并在德国莱比锡世界版画赛上获金质奖章的水印套色木刻，被挂在显眼的位置。泛黄的镶料在娓娓诉说着它的年轮，“以少胜多”的艺术手法也使之能闹中取“静”。看得出，这是先生的珍爱，那小女孩吹蒲公英的单纯而诗意的画面，恰恰应对着先生心灵的澄明和晶莹。

还有一“多”，则为最多的陈设品——美不胜收的石头，那简直会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，先生的家堪称“美石”的小博物馆。先生自己也曾说：“赏石活动和艺术创造虽大有差别，但是包含给石头命名、配座与陈列设计，不能不伴有相应的观察、想象、联想、思索和体悟，而这一切也带有接近艺术创造的创造性的思维特点，它也体现着个人审美素养的深浅与高低”。先生那种从艺术鉴赏和艺术批评来“做”美学的方式，浸渍着中国传统原生的美学智慧，只是所能从者寥寥。在先生之后，研究美学理论的往往不能深入艺术实践，而搞艺术创作的却常常缺乏美学思维，的确令人感慨。

那天，先生精神矍铄，兴致颇高，非常愿意与我们年轻人交流，完全看不出他已是位耄耋老人。有几段谈话令我记忆犹新。先生毕生都崇尚真善美的会通，反对与假恶相关的丑，所以他加重语气地说：“从审美的角度，也要符合真和善的标准”，“如果不真、不善，那哪能美呢？！”先生继续着他的美学沉思，还借用了“事实胜于雄辩”的话，来说明较之“审美关系”更重要的是“美的事实”本身！

“审美关系说”是先生的成熟的美学主张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一贯强调美学研究真正面对的是现实生活。回想到拜访前日俄罗斯“列宾美术学院”来华办的画展，展览题记上就镌刻着隽永的圆体烫金俄文“美是生活”。或许，对于先生来说，“美就是生活”，“生活也就是美”吧。

造访持续了很长时间，直至先生必须要休息了。道别之后，我望见先生的背景，步履非常坚定，长长的青丝在头上颤颤的，似乎有一种交谈后的喜悦和畅快之情。

最后一次到先生家拜访之前，情况就不太好了，屡屡听说先生的身体欠佳云云。当时的我已被调入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美学室工作，担任中华美学学会的副秘书长。

众所周知，先生曾任中华美学学会的会长，至今还是学会的唯一的一位名誉会长。早在1961年，先生便着手组织全国美学界来主编高校文科教材《美学概论》。洪毅然、于民、马奇、甘霖、杨辛、李泽厚、叶秀山、刘纲纪、朱狄、周来祥、李醒尘、司有伦先生等等这些编写组的成员，后来都成为了中国美学界的骨干力量。《美学概论》自1981年出版以来，已印行29次至今而未衰，在中国当代的美学教育中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。

就在那个阴霾笼罩下的寒冬，我们来到了先生刚刚搬来不久的新家，在北京繁华的惠新北里，在先生一直工作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旁边。

新居很大，空旷得竟有几丝寒意。《蒲公英》仍被静谧地挂在墙的中心。画面上的那个仍在吹蒲公英的小女孩寂寞了许多。那么多石头却被一五一十地安置在新漆的博古架上，显得少了几分随意和偶然。一切似乎都被套上了新装，但打心眼里说，我还是

更喜欢那个温暖的老屋，那个沐浴在和煦日光里的老屋。

许久，许久，先生才从内屋被搀扶着踱了出来，我们都站了起来。看着老人慢慢地弓腰坐在靠背椅上，看着老人坐在那里慢慢地喘着气……当时我们一声不吭，也说不出什么，只能看着、看着，整个屋子都弥漫着静静与缓缓的气息。

后来，我们只能贴着耳朵与先生说话，先生的声音低弱得只有靠近他才能听清。具体说些什么，大都已淡忘了，只记得老人在身体孱弱的情况下仍坚持接待了我们。当时我们只想快一点结束，好让先生好好休息休息，但先生还是坚持多说了几句，没想到短短十几分钟居然那么难挨。

再后来，我们站在新居的中央，目送着老人朝内屋踱去。老人只给了我们一个孱弱的背影，穿着垂地睡衣的背影。他是自己走回去的，随着缓慢的步履背部微微在颤，不时用微抬的左手轻扶着墙，在慢慢地前行，在慢慢地前行……我们全都僵在那里，心酸的感觉使我眼底开始湿润。在先生快进到屋内的瞬间，同去的摄影师才想起了什么，匆忙地按动了快门，打碎了时间的凝固。

出门之后，摄影师却大呼失望，因为他发现相机里已没有了胶卷，他把这视为摄影生涯里的一次失败。但我总觉得，这倒是“鬼使神差”，先生那蹒跚独行的背景已“定格”在我的脑海里了，永远也无法抹去。

行文至此，我突然想起王朝闻先生写给刘纲纪先生信（后来被公开发表）中的一段话，不仅说得很有隐喻而且异常洒脱：“赏石活动与道法自然的哲学观点的关系，我还有些不成熟的想法要说，但我的独眼像戏曲或评书《挑滑车》里的那匹战马向主人高宠说它受不了啦那样，我也只能趴下而不再写下去，最后说声再见了……”

那些曾被先生把玩的奇石，孤寂地躺在那里，也在想念着先生吧，我想。

苗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（美学室）研究人员，

中华美学学会副秘书长，博士。

地址：北京建内大街5号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美学室（100732）

电话：010-64320819 13681400332

网址：liuyuedi@sohu.com